

## 同善堂義學早期的發展

鄭振偉

**[摘要]** 同善堂中學歷史悠久，它的前身是同善堂義學。義學始於 1924 年，為貧民而設，初時只收男童，但關於這所義學的歷史多語焉不詳，故本文嘗試探索該義學早期的一些發展。本文於論述時盡可能以原始資料為依據，筆者先是從《華僑報》篩查和整理與同善堂義學相關的報導，再檢閱《澳門政府公報》和澳門檔案館的檔案資料，並參用同善堂歷史檔案陳列館度藏的已數字化的各類文物、檔案和文獻，其中亦包括近年出版的三種史料叢刊。筆者探究的主要是該校從創辦到新小學校舍啟用後的一些具體情況，諸如經費的籌措、義學校的管理、學生和教員的基本情形，以及校務的拓展等，並藉此瞭解前賢為社會育才的善舉，以及義學對推動澳門普及教育的貢獻。

**[關鍵詞]** 同善堂 義學 崔諾枝 高可寧 崔德祺

### 一、前言

同善堂轄下設有一所中學和一所小學，中學始於 1991 年 9 月，小學則始於 1924 年 8 月的一所義學。澳葡政府遲至 1995 年才落實 7 年免費教育，<sup>①</sup> 但同善堂小學在此以前一直是學雜費用全免的學校，也是澳門唯一的一所免費小學，其辦學宗旨就是“服務市民勞苦大眾，提供全部免費教育，為社會作育英才”。<sup>②</sup> 關於這所義學早期的發展，介紹大多簡略，一般也會把它視作同善堂慈善事業的一部分。近年澳門各界對於文化保育有更多的關注，教育史料較過去更易掌握，<sup>③</sup> 故本文將借檔案、文物、報刊等原始資料來重新整理同善堂義學早期的一些發展情況。同善堂小學校舍於 1968 年落成後，同善堂在小學以外開設了預備班（幼稚園），夜校部也增設五、六年級，同善堂小學開始進

作者簡介：鄭振偉，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sup>①</sup> 第 29/95/M 號法令，免費教育包含小學教育預備班及小學教育總共七個年級，見《澳門政府公報》，1995 年第 26 期第一組（1995 年 6 月 26 日），頁 928 - 930。

<sup>②</sup> 教育暨青年司：《澳門學校特徵 1993/94》，澳門：教育暨青年司，1994 年，頁 374。

<sup>③</sup> 同善堂近年與澳門理工學院（2022 年更名澳門理工大學）中西文化研究所合作整理編輯的“同善堂史料叢刊”已率先出版其中的《同善堂金石碑刻匾聯集》、《同善堂歷史圖片選粹》和《同善堂歷史檔案文物選錄》三種，又澳門中華教育會於 2010 年舉辦的“澳門教育史料展”，各學校單位和澳門懷舊收藏學會的羅景新、姚鴻光、尹德衛和麥霖諾先生不吝借出各類珍貴藏品。此外，一些數字化資源如澳門檔案館的檔案、《澳門政府公報》、澳門《華僑報》的“華僑報歷史資料庫”，以及澳門基金會開展的“澳門記憶”文化保育網站等，更是便利研究。

入“施學育人”的嶄新階段，<sup>①</sup> 故本文將以 1970 年作為書寫的下限。

## 二、同善堂義學的緣起和早期經費

光緒二十二年（1896）譚鍾麟撰〈倡建蠓鏡同善堂碑序〉，曾期許同善堂“使能於養老、義學次第舉行，將見里有仁風，萬眾咸登康樂”。<sup>②</sup> 義學其後於 1924 年設立，<sup>③</sup> 幾經變化發展，迄今將近有 99 年的歷史。《澳門同善堂徵信錄（甲戌年）》（1934）記“大中華民國拾三年甲子歲孟秋倡設貧民義學校”，<sup>④</sup> 甲子年七月初一即 1924 年 8 月 1 日。其時在澳門設立的義學另有鏡湖義學，而同期的“華僑公立平民免費義學”也在 1924 年 9 月開設的。<sup>⑤</sup> 有說當時籌設“平民義學”，緣於鏡湖義學於 1905 年將分設各區的五所義塾合併後，年紀較小和住所較遠的貧家子弟無法前往讀書，熱心人士於是籌組義學，而為求普及，故在各區分設，凡貧苦居民較多的地方即設一校。<sup>⑥</sup> 是故同善堂於 1924 年設立貧民義學校未始無因，而 1924 年正是同善堂位於爐石塘的新址落成之時，<sup>⑦</sup> 堂內才有空間可供闢作義學教室。<sup>⑧</sup>

現存 1939 年的《高可寧先生像贊並序》碑文記述高可寧在救濟失學兒童方面的事功，記曰：“先生又謂貧兒失學比疲癯殘疾尤可憫，爰於堂內設義學，經費與李際唐先生分擔，閱四載始交本堂值理肩任，既而募養學基金，立捐千元，展築校舍，又捐千元。學校自無而有，此誰之力者？”<sup>⑨</sup> 義學初創時期，高可寧和李際唐二人在經濟上的支持

- 
- ① 〈同善堂中學校史〉，黃德進主編：《同善堂中學建校九十五週年紀念特刊》，澳門：同善堂中學，2019 年，頁 46。
- ② 林發欽、王焘主編：《同善堂金石碑刻區聯集》，澳門：同善堂，2017 年，頁 28。凡原始文獻標點均為筆者所加，下文不另作注。
- ③ 同善堂歷史檔案陳列館內的瓷相牆上，其中一幀瓷相記“盧焯孫先生捐助本堂義學校經費銀五百元，爰繪肖像以留紀念，而伸景仰，以誌弗諼。中華民國十年九月仲冬穀旦本堂識”。盧焯孫是己巳年（1929）和庚午年（1930）的總理，居於“公推總理芳名列”首位，而“民國十年九月仲冬”應是“民國十九年仲冬”之誤。首先，同善堂這批瓷相至少有 38 幀與創建和重建同善堂相關，日期都是民國十三年，沒有更早的，可以推斷以瓷相來紀念捐資者或始於同善堂重建；其次，早期瓷相記月份的方式幾乎全都是春、夏、秋、冬配上孟、仲、季的寫法；再者，民國十九年冬尚有三張瓷相同是紀念捐助義學經費的人士；最後，九月不是仲冬。
- ④ 《澳門同善堂徵信錄（甲戌年）》，澳門：同善堂，1934 年，插頁。
- ⑤ 平民義學與鏡湖小學合併前的發展可參考鄭振偉：《1940 年代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頁 112 - 118。
- ⑥ 魯俠（黃蘊玉）：〈鏡海話滄桑（145）〉，《華僑報》（澳門），1959 年 10 月 3 日。據該文所記，從 1924 年開始，不到一年的時間便先後出現七所平民學校，並以次第命名，如第一校、第二校、第七校等。平民學校的各所學校不是採用分校形式運作，一切事務交由辦事處的書記呂廷廣主持，而他也是從開校一直服務至平民小學與鏡湖小學合併為止。該校校董會主席梁後源在創校二十週年紀念會上報告校況時亦提到“分區設立，以便貧民就學”的用意，見〈平民義學廿週年紀念席上澳督希望破除自私〉，《華僑報》（澳門），1943 年 4 月 7 日。
- ⑦ 同善堂新址於當年五月十七日（1924 年 6 月 17）舉行開幕禮，澳督親臨主禮。見〈澳門同善堂開幕誌盛〉，《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4 年 6 月 20 日。
- ⑧ 同善堂於辛酉年（1921）購入爐石塘街 55 號連前後 6 間屋，以及 57 號舖 1 間；辛酉（1921）至甲子（1924）四年間重建同善堂；乙丑年（1925）重建林家圍屋 2 間，又重建同善堂連林家圍屋 3 間。《澳門同善堂徵信錄（甲戌年）》，1934 年，葉 78。
- ⑨ 林發欽、王焘主編：《同善堂金石碑刻區聯集》，澳門：同善堂，2017 年，頁 106 - 107。

另有一則報導如下：“同善堂義學於民國十四年由該堂值理高可寧、李際唐發起舉辦，每捐二百五十元，經辦三年後，交由同善堂辦理，初辦時僅容學生六十人，後擴充學額增至二百六十餘人。”<sup>①</sup> 這則 1947 年的報導所提及的創校日期有誤，但義學於 1929 年交由同善堂辦理這一點卻是一致的。<sup>②</sup> 贊序中提到“募養學基金”和“展築校舍”二事，前者應是 1931 年的捐贈（見下文），後者或與 1936 年增收女生有關。<sup>③</sup>

至於早期經費來源，現存崔諾枝和李際唐二人繪於辛未年（1931）的全身畫像各附有一則說明：（1）“崔諾枝先生經手募捐同善堂義學校經費銀四仟餘元。敬繪肖像懸堂，而伸景仰。昔中華民國十年孟春吉日，本校謹識”；（2）“李際唐先生首倡設立本堂義學，慨助學金，辛未年倡議擴充義學額，又蒙捐助學費壹仟元，足見廬懷樂育，恢儒右文，至堪欽敬。爰繪玉照懸堂，以留紀念，而伸景仰。中華民國二十年仲春穀旦，本堂謹識”。<sup>④</sup> 在堂內懸掛捐贈者畫像是同善堂申謝的方式，而這兩則資料說明義學於 1931 年因崔諾枝募捐和李際唐捐贈而得以將學額擴充。<sup>⑤</sup> 現存的〈同善堂置業碑記〉記“義學會業列：馮家圍街門牌一號、三號、五號、七號、九號、十一號、十三號、十五號、十七號、十九號共十間”。<sup>⑥</sup> 位於馮家圍的這些物業購於辛未年（1931），連“衙門使用”共銀西紙 11,574.62 元。<sup>⑦</sup> 高可寧為義學“募養學基金”，崔諾枝和李際唐二人又曾於 1931 年為義學籌募經費，應促成置業一事。陳清泉記崔諾枝在同善堂的勳勞，指“迨至壬申……因發起募捐，籌資購產，以為養學基金……湊置馮家圍屋業數間，所收租息，悉充校費”，<sup>⑧</sup> 但壬申年（1932）應為誤記。又該碑記上另有“施棺會”和“保產會”，以及由“周卹善會、水陸超幽會、施藥劑會、施棺木抬工會”合置的產業。置業碑記提供了一項重要信息，那就是同善堂設有“義學會”，其性質或與堂內其他善會相同，或是由值理“集同人倡舉勸捐，將捐項統交同善堂歷年值事收管，行息或置業收租，因入量施”。<sup>⑨</sup> 同善堂甲戌年（1934）在義學項下所得捐款為 4,072.4 元（毫銀，下同），

① 〈同善堂開會議決，同善[堂]義學聲請立案〉，《世界日報》（澳門），1947 年 12 月 8 日。

② 高可寧是丁卯年（1927）和戊辰年（1928）的主席，1929—1934 年間同善堂“公推總理芳名列”未見高可寧的名字，但到 1934 年，他和李際唐、崔諾枝和麥明等四人並列“公推永遠值理”，見《澳門同善堂徵信錄（甲戌年）》，1934 年，葉 18 下—20。

③ 同善堂於 1934 年曾經擴充義學，現存一批紀念捐助者的半身瓷相，其中一張記黃豫樵夫婦於“癸酉十二月廿七日”六一大壽，同善堂剛好擴充義學，曾捐助 500 元（毫銀），癸酉年十二月廿七日即 1934 年 2 月 10 日。該筆捐助見於《澳門同善堂徵信錄（甲戌年）》，1934 年，葉 106 上。

④ 王熹等主編：《同善堂歷史檔案文物選錄》，澳門：同善堂，2020 年，頁 128。

⑤ 現存同類的文物另有董慶堂的全身畫像，其中有說明：“董慶堂先生捐助本堂經費雙毛[毫]銀式仟元，又助義學經費壹仟元，又捐施粥款伍佰元。爰繪玉照懸堂以留紀念而伸景仰。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季夏吉日，同善堂謹識”，見《同善堂歷史檔案文物選錄》（頁 130），但這次捐贈是他的遺願，見〈董慶堂家屬遵遺言捐款充善團經費〉，《華僑報》（澳門），1943 年 7 月 2 日。

⑥ 林發欽、王熹主編：《同善堂金石碑刻匾聯集》，澳門：同善堂，2017 年，頁 52—53。

⑦ 《澳門同善堂徵信錄（甲戌年）》，1934 年，葉 78。原物業於 1931 年 4 月 30 日經由澳門民事兼商事法院拍賣，見〈法院告白〉，《澳門政府公報》，1931 年第 15 號（1931 年 4 月 11 日），頁 315—316。

⑧ 陳清泉：〈同善堂之勳勞〉，《崔諾枝先生善績紀略》，澳門：澳門中華印務公司，1938 年，頁 17。

⑨ 《澳門同善堂徵信錄（甲戌年）》（葉 92）附有各善會的勸捐小引、本堂規則和進支數列，引文來自保產善會。

從義學會業所得租金為 1,320.17 元，總收入 5,392.57 元，支出 1,283.4 元，進支比對存 4,109.17 元，<sup>①</sup> 觀乎租金的收入已足夠維持義學。“義學會”自置物業的租金收入為義學提供了穩定的經濟來源，其運作應仿照傳統宗族以公田收入為族中貧寒子弟提供免費教育。從 1934 年的《徵信錄》所見，除每年一度的沿門勸捐外，同善堂另有義學募捐。義學募捐共見十六本“緣部”（募捐的簿冊），分別冠以崔諾枝翁、蔡文軒翁、鄭雨芬翁、陸直興翁、麥明翁、羅餘翁、陳伯墉翁、李卓廷翁、高可寧翁、潘德馨翁、李如楷翁、梁彥明翁、陸翼南翁、尹月洲翁、余顯榮翁和林鑑宸翁等，應即由各人負責不同的捐冊。<sup>②</sup>

### 三、義學的管理和發展

關於同善堂早期的管理，就《澳門同善堂徵信錄（庚辰年）》（1940 年）收錄的〈大公堂規條〉所見，值事每逢周日十一點在大公堂聚會議事，其中又提及曾將值事人數從 10 名增至 12 名；全體值事於每年的正月互相推舉總理 2 人和值理 10 人，又每班輪值一年，而前一班再留作下年的幫班，總理專管“銀兩數目契券附項等件、夾萬分匙兩條”，值理則“管理醫堂藥劑執字紙並講堂等事，又要稽查總理所管數目”。<sup>③</sup> 然而，由於同善堂有不同的事務，值理各有專長，隨着堂務的發展，在管理上採用分工合作的模式。報載該堂於 1938 年 2 月 14 日（正月十五日）“援例”推選總務、財政、租務、會務、工程、施藥、校務和交際等部主任，梁彥明、徐佩之和劉耀墀三人當選校務部主任。<sup>④</sup> 分部辦事的慣例始於何時暫不可考，但筆者從報章整理所得的資料，同善堂的值理會截至 1976 年仍設有校務部，從 1977 年開始才改為校務委員會。<sup>⑤</sup>

#### （一）申辦准照

據黃鴻雁整理所得，同善堂值理會的架構到 1933 年以後才算基本完備。<sup>⑥</sup> 就報章所見，同善堂義學早期應如其他學校般設有校董會，1938 年和 1941 年該校的畢業典禮

<sup>①</sup> 《澳門同善堂徵信錄（甲戌年）》，1934 年，葉 40。

<sup>②</sup> 《澳門同善堂徵信錄（甲戌年）》，1934 年，葉 106 - 109。1940 年 9 月 16 日第 23 次值理常會，財政部報告善款窘絀，便曾議決“應發緣部各值理，請求募集，以彌缺款”，見〈同善堂昨開值理會議〉，《華僑報》（澳門），1940 年 9 月 17 日。

<sup>③</sup> 《澳門同善堂徵信錄（庚辰年）》，澳門：同善堂，1940 年，葉 4 下 - 5 上。

<sup>④</sup> 〈同善堂常會紀〉，《華僑報》（澳門），1938 年 2 月 15 日。

<sup>⑤</sup> 這個改動可能是同善堂於 1976 年開了第一所托兒所，所以 1977 年才分設校務委員會和托兒所所務委員會，托兒所 11 名委員有 7 名也是校委。

<sup>⑥</sup> 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頁 232。

均見出席校董的名字，<sup>①</sup> 估計校董應是值理的一個角色，至於日常與教學相關的事務應由校務部辦理，至於須討論的事項則交由值理會議決，例如教員的續任和延聘等。<sup>②</sup> 1924年同善堂新址落成後，周鳳池和高可寧在7月26日分別當選該堂正副主任；<sup>③</sup> 高可寧於其時倡辦義學，義學理應由他主持，之後也許就交由歷年的值事共同管理。據澳門華視學會1927年11月9日的函件記錄，<sup>④</sup> 同善堂於1927年10月申辦義學“准照”，何肅、劉振晃和華視學會秘書 Mário Horácio Gracias（漢譯名“雅馬廖”）前往視察。該報告的內容涉及四所學校，其中記義學設於同善堂二樓一個寬敞、光線足和空氣流通的大房間，有一位校長和三名教員，完全免費，由同善堂的經費維持，只收男生；視察員對各校教員的能力沒意見，又認為應向同善堂值理會發給設校准照。<sup>⑤</sup> 可以補充一點的是，崔諾枝曾於1926年2月17日與盧煊仲、許祥、劉振晃、何寶巖、陳七和徐佩之等共七人獲委任為華視學會委員，崔諾枝於翌年獲准卸任並由華務局漢文文案何肅替代，<sup>⑥</sup> 而崔諾枝、許祥和劉振晃三人的身份剛好也是同善堂的總理。

## （二）早期的校長和主任

〈同善堂沿革概況〉一文記述同善堂於1924年重建後之首任主席為周鳳池，繼之者為高可寧、盧焯孫、李際唐、崔諾枝、蔡文軒，以及當屆主席黃渭霖，<sup>⑦</sup> 這個順序與《澳門同善堂徵信錄（甲戌年）》歷年“公推總理芳名列”居首位的名字完全一致。甲子（1924）至丙寅（1926）這三年是周鳳池，丁卯年（1927）和戊辰年（1928）是高可寧，己巳年（1929）和庚午年（1930）是盧焯孫，辛未年（1931）和壬申年（1932）是李際唐，癸酉年（1933）和甲戌年（1934）是崔諾枝。<sup>⑧</sup> 1929—1947年間義學校長誰屬應

① “到校參加者有校董會主席兼校長崔諾枝及校董蔡文軒、陸翼南、鄭雨芬、陸直興、李如楷、盧宗縉、黃仲良、余達洪、羅餘、尹月洲、馮泐、黃漢興及各生家長等”，見〈同善堂義學校昨行畢業禮紀〉，《華僑報》（澳門），1938年1月17日。“有校董鄭雨芬、葉子如、陳伯塘、余達洪、李如楷、盧宗縉、陸直興、陸翼南、黃渭林（霖）等”，見〈同善堂義學行畢業禮〉，《華僑報》（澳門），1941年1月14日。以華僑公立平民義學為例，早期採用總理制度，有名譽總理、總理、協理以及各部職員，崔諾枝正是1928年該校的總理，大概是1930年前後總理制度改為校董事制，名額15人，正副主席及各部職員由校董互選兼任。

② 中華教育會曾商借同善堂三樓義學教室辦理國語班，經主席黃渭霖和三位校務主任同意後，也是經過討論才決定。見〈同善堂值理常會紀〉，《華僑報》（澳門），1947年2月26日。

③ 關於值理的任期，現存1934年的《徵信錄》的殘頁與1940年的《徵信錄》所見的相同，值理於每年十二月初一日恭辭，下年正月十五日商定，至二月十五日交代。這個安排與同善堂1893年的章程規定相近，但1924年該堂新址落成後，曾在六月廿五日（1924年7月26）推舉正副主任和總理，周鳳池獲15票當選主任，高可寧5票當選副主任，其他總理有李際唐、曹子英、崔諾枝、麥明、蔡克庭、利希慎、黃叔平、李雁賓、林頤山、徐俊廷、許祥、馬瑞南、曾焯周、余贊初、黃錫元、劉振晃、溫連、阮穗楠、盧鳳文、蕭汝輝、蔡本和余惠民等，合共24人。見〈澳門同善堂公舉主任總理〉，《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7月29日。

④ 華視學會的其中一項職能是監督和視察由華人開辦的私立學校。見“Portaria No. 300”（〈規定本澳中國學堂所收各學生之規則〉），*BOGPM*（《澳門憲報》），vol. 14, no. 51, 19 Dec 1914, p. 694。

⑤ 澳門檔案館藏，編號：MO/AH/EDU/JIECM/03/0001。

⑥ “Portaria No. 42”（〈委任華視學會會員〉），*BOGPM*, 1926-No.8, 20 Feb 1926, p. 114; “Portaria No. 149”（〈委任華務局漢文文案何肅兼任華視學會委員〉），*BOGPM*, 1927-No. 28, 9 July 1927, p. 532。

⑦ 《澳門今日之僑運》，澳門：澳門世界出版社，1948年，頁17。

⑧ 《澳門同善堂徵信錄（甲戌年）》，1934年，葉17下—20上。崔諾枝從1933年開始出任主席直至離世，見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311。

可以此為據。1938 — 1976 年同善堂設置校務部的這個時期，前十年仍然由主席兼任校長，惟 1947 年 11 月同善堂值理會議決向僑務委員會立案，同年 12 月即推選黃渭霖（董事長）、葉子如、梁松、黃仲良、冼碧珊、蔡文軒（校長）和高可寧等七名值理為義學校董，徐佩之和李世明為後補校董，然後具呈向僑務委員會立案，<sup>①</sup> 是故 1948 年春值理互選時未有推選校務部主任，當時校董會曾定下每月開會一次，以利推進黨務。<sup>②</sup> 1949 年值理會改選後，由盧怡若出任校長，並加入李際唐，另前述的九人除蔡文軒外全都出任校董會成員，並曾議決由盧怡若全權負責一切工作。<sup>③</sup> 1950 年同善堂恢復由主席兼校長的舊制，但這個安排從 1952 年開始改變，應是考慮到義學發展的需要，當年推舉莫培樾為專責校長，<sup>④</sup> 而莫培樾一直出任該職位至 1966 年止，到 1967 年才由崔德祺出任校長。這個時期亦應不設校董會。<sup>⑤</sup> 據筆者整理所得，<sup>⑥</sup> 校務部 1950 — 1959 年間的人數（連校長）維持 4 人（1954 年例外），1960 — 1974 年間的人數從 5 人遞增至 8 人，1969 年增設副校長，整個團隊相當穩定（表 1）。崔德祺早於 1955 年便開始一直擔任同善堂的正主席，<sup>⑦</sup> 故 1967 年出任校長時又隱約回復由同善堂主席兼任校長的傳統。

① 〈同善堂義學進行向僑委會立案〉，《華僑報》（澳門），1947 年 11 月 28 日；〈同善堂開會議決，同善[堂]義學聲請立案〉，《世界日報》（澳門），1947 年 12 月 8 日。

② 〈同善堂值理常會〉，《華僑報》（澳門），1948 年 2 月 25 日。

③ 〈同善堂互選〉，《華僑報》（澳門），1949 年 2 月 3 日；〈同善堂主席葉子如當選〉，《華僑報》（澳門），1949 年 2 月 23 日。

④ 〈同善堂昨開值理會〉，《華僑報》（澳門），1952 年 2 月 1 日。

⑤ 《華僑報》上關於該校 1956 — 1970 年在七、八月間舉行的畢業禮報導，從來只是值理出席、捐贈又或頒發證書獎品云云，從沒提及校董二字。

⑥ 《華僑報》所見同善堂每年正月值理會的報告。

⑦ 同善堂的文物中有一幅崔德祺先生的贊文，記“先生膺任本堂主席，領導善舉”，贊文的日期是 1953 年 1 月 15 日。見《同善堂歷史檔案文物選錄》，頁 136。然而，據《華僑報》1953 年 2 月 19 日的報導，黃仲良獲選正主席，黃漢興和崔德祺獲選副主席；又《華僑報》1954 年 2 月 8 日報導，三人分別蟬聯正副主席；又《華僑報》1955 年 1 月 29 日報導，崔德祺當選正主席，黃漢興和冼碧珊當選副主席。

表1 同善堂義學／同善堂小學校早期的校長和校務部主任

年份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校長	崔諾枝 <sup>①</sup>									蔡文軒
委員	不詳	梁彥明 徐佩之 劉耀墀	不詳	梁彥明 郭秉琦 徐佩之	不詳					徐佩之 劉啓明 盧宗縉
年份	1947	1947.12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校長	黃渭霖	蔡文軒	盧怡若	葉子如	黃仲良	莫培樾				
委員	冼碧珊 盧怡若 徐佩之	校董會	校董會	徐佩之 李榮貴 王德彰	不詳	徐佩之 王德彰 李榮貴	黃傑源 黃深明	黃傑源 黃深明 李世明		
年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校長	莫培樾									
委員	黃深明 李世明 劉明新		覃桂 李世明 劉明新	李世明 覃桂 劉明新 李瑞章		覃桂 李世明 劉明新 李瑞章 冼永就			覃桂 李世明 劉明新 李瑞章 冼永就 區子燕	
年份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校長	崔德祺									
委員	莫培樾 覃桂 李世明 劉明新 李瑞章 冼永就 區子燕	莫培樾 覃桂 陳滿 劉明新 李瑞章 冼永就 區子燕	陳滿（副校長）							
			莫培樾 覃桂 劉明新 李瑞章 冼永就 區子燕	莫培樾 覃桂 劉明新 李瑞章 許世元 區子燕	不詳	莫培樾 覃桂 劉明新 李瑞章 許世元 鄧頌儀	不詳	莫培樾 譚基 劉明新 李瑞章 許世元 鄧頌儀	不詳	許世元 覃桂 劉明新 黎卓彬 莫培樾 譚基 鄧頌儀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華僑報》歷年的報導編製。

上表部分資料不詳是因為未見報導，但仍可以用前一年或後一年的名單來推測。1941—1944年是非常時期，同善堂的值理都是連任，<sup>②</sup>但1944和1945年的值理會曾加入陳瑞槐、梁松、盧宗縉和李際唐，取代尹月洲（身故）、鄭雨芬、徐慶成和李寶書等。<sup>③</sup>

<sup>①</sup> 崔諾枝於1945年8月逝世後，主席一職由蔡文軒接任。就所見1941（1940.12）、1942（1941.11）、1943（1943.4.1）、1944（1943.12.31）和1945年（1944.12.28）同善堂的預算冊都是蔡文軒以主席的身份向政府呈交的。然而從報章所見，崔諾枝在該時期仍然是以主席身份出席同善堂的值理會和活動，只有1943年8月以前曾向各社團告假多月。見〈崔諾枝病愈銷假，昨復出席各善團〉，《華僑報》（澳門），1942年8月3日。

<sup>②</sup> 〈商會及同善堂值理將四屆連任〉，《華僑報》（澳門），1943年12月6日。

<sup>③</sup> 〈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李際唐允就同善堂值理〉，《華僑報》（澳門），1945年1月31日。

### (三) 義學的學生和教員

同善堂義學原屬書塾式學堂，崔樂其憶述幼年時就讀於同善堂義學，指當時“教授的科目只有尺牘、珠算、書法、三字經、千字文，以及千家詩等”，<sup>①</sup> 據稱同善堂是1937年秋才改辦初級小學。<sup>②</sup> 黃雁鴻曾在《澳門年鑑》中找到早期教員的名字：1925年的是 Iong-liu-poc 和 Chiang-in-tou，學生 45 名；1927 年的是 Kiang-in-tou 和 Iong-lin-pac，學生 60 名。<sup>③</sup> 余活仙和鍾榮階是另外兩位早期的教員。<sup>④</sup> 崔諾枝在 1941 年的畢業典禮上致辭時曾提及“爰乃發起擴充女校，招收女生六十名”，<sup>⑤</sup> 鍾榮階記崔諾枝於 1936 年首創女子義學。<sup>⑥</sup> 當時社會仍較保守，故男女分班教學，而另一位女教員鍾兆貞於 1937 年已在職。<sup>⑦</sup> 現存癸未年（1943）值理就職時拍攝的一張照片，<sup>⑧</sup> 背景見同善堂門外欄柵上一則告白：“陳勝佳先生任 □□□□／鍾榮階先生任男校教員／鍾兆貞先生任女校教員”。陳勝佳是余活仙於 1941 年 9 月病逝後才聘用的。<sup>⑨</sup> 義學設初小共四個年級，男女學生要分班教學，故當時採用的應是複式教學，也就是同一個課室有不同級別的學生，但只有一位教員。

從歷年“在華視學會注冊的私立學校”的報告所見，同善堂義學 1928 — 1935 年間學生人數維持在 100 名，教員 2 名。1936 年同善堂增設女校，原有男生 100 名，添加女生 60 名，教員 3 名；1937 和 1938 年的男女生人數如前。<sup>⑩</sup> 義學於當時仍是春季始業，<sup>⑪</sup> 也就是農曆正月下旬開學，陳清泉曾記戊辰年（1928）學額擴充至 100 名，經費亦由當

① 崔樂其：〈在發展中的同善堂小學與托兒所〉，《同善堂九十周年特刊》，澳門：慶祝同善堂創立九十周年籌備委員會，1982 年，頁 8。

② 榮：〈同善堂大事紀要〉，《同善堂九十周年特刊》，頁 83 — 84。

③ 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頁 225。教員名字的寫法雖然有點不同，但估計只是音譯和誤植問題。當時澳門其他義學的人數並不多，如媽閣廟義學 40 名，鏡湖醫院義學 60 名，蓮峰義學 35 名。又 Chiang-in-tou 或即鄭彥陶。

④ 《澳門同善堂徵信錄（甲戌年）》（葉 40）的明細中有余活仙和鍾榮階兩位教員的“修金”和“福食”的支出，分別同為 300 元（毫銀）和 102 元（毫銀），故二人於 1934 年已在職。澳門“致知學校”於 1927 年 12 月填報華視學會的資料，余活仙時年 40 歲，南海縣籍，“前清時代肄業有年，曾在本縣師範畢業”，任教歷史、經學和國文，又曾在“澳門德隆新街十號充當專席五年”；又澳門“尊德學校”於 1927 年 9 月填報的資料，鍾榮階時年 25 歲，籍貫順德，“澳門崇實學校修業叁年，廣東嶺南中學修業叁年”，任教國文和算術，又曾在“廣東海康縣陳氏家塾任職叁年”。見澳門檔案館藏，編號：MO/AH/EDU/CP/06。此外，細明中另有一筆羅八教織藤唸師十個月的福食支出，以及經由羅八購買刀、剪、拈、藤和草蓆等工具和物料的開支（葉 50），這說明當時義學校的學生也學習謀生的工藝。

⑤ 〈同善堂義學行畢業禮〉，《華僑報》（澳門），1941 年 1 月 14 日。

⑥ 鍾榮階：〈同善堂義學之維持與擴充〉，《崔諾枝先生善績紀略》，澳門：澳門中華印務公司，1938 年，頁 19 — 20。

⑦ 〈同善堂常會紀〉，《華僑報》（澳門），1938 年 1 月 17 日。

⑧ 李璟琳、溫學權主編：《同善堂歷史圖片選粹》，澳門：同善堂，2018 年，頁 14。

⑨ 〈同善堂施粥經費口大〉，《華僑報》（澳門），1941 年 9 月 20 日。陳勝佳於 1943 年 4 月向同善堂告假，教席由何桂邦暫代，見〈同善常會議決增派難童餐五百分〉，《大眾報》（澳門），1943 年 4 月 30 日。

⑩ 澳門檔案館藏，編號：MO/AH/EDU/JIECM/03/0001、MO/AH/EDU/JIECM/03/0002。

⑪ 同善堂義學於 1948 年的正月開學仍為春季始業，1951 年於秋增設高小，即當時已改為秋季始業。見〈同善堂義校增五六年級〉，《華僑報》（澳門），1951 年 7 月 11 日。

年值理負責。<sup>①</sup> 現存攝於1931年9月紀念該義學成立八周年的全體師生合照共見94名學生，1934年9月11周年的有89名。<sup>②</sup> 就1929/30年度的資料所見，澳門各義學只有蓮峰義學有100名學生，漳泉、孔教、鏡湖、李際唐，以及各所平民義學等，人數約為60名。1938年1月16日（即1937年的農曆十二月十五日）的畢業禮有14名學生及格畢業，<sup>③</sup> 1948年1月的畢業禮也是14名學生畢業，<sup>④</sup> 畢業的學生人數似乎不多。1940年春，同善堂曾有意在當年秋季增加男女義學學額各100名，但條件是必須先覓得校址，<sup>⑤</sup> 但1939/40年度呈報的學生人數仍然是男生100名，女生60名，<sup>⑥</sup> 故或未有成事。據1943年5月的報導，同善堂其時有240多名學生，<sup>⑦</sup> 之後應有遞減。1947年初，報導指義學的人數從過往每年160名增至250多名，故值理會議決增聘一年級女教員陳蕙蓉，教員由是增至4人。<sup>⑧</sup> 為求擴大招生額，同善堂於1948年初徵得該堂後座租客同意遷出，將原有空間改作課室用途。鍾榮階報告當時有二百多名學生，一二年級相當擠擁，三四年級則尚有名額18個。<sup>⑨</sup> 鍾榮階的說法或許反映當時正是一二年級和三四年級分別採用複式教學。該堂後座於住戶遷出後被改建為三個課室，提供120個學額；課室增至六個，一二年級各有甲乙兩班，三四年級各一班，並增聘三名教員即何桂邦、廖芳和湯慧文。<sup>⑩</sup> 四年級於九月開學後仍有名額，同善堂在報上刊登招生廣告。<sup>⑪</sup> 從報章的一些新聞所見，1946年12月有160名學生，1947年12月有226名學生（男149名，女生77名），1948年12月已增至有300名學生。<sup>⑫</sup>

同善堂義學原只設初小一至四年級，畢業生升學須轉至其他學校。1951年7月，校董會議決於秋季增設高小五至六年級，以便學生原校升學，其後並獲鍾子光捐助經費。<sup>⑬</sup> 然而，早在之前一年同善堂便有擴充義學的計劃。黃仲良於1950年8月代表同善堂投

① 陳清泉：〈同善堂之勳勞〉，《崔諾枝先生善績紀略》，澳門：澳門中華印務公司，1938年，頁17。

② 李璟琳、溫學權主編：《同善堂歷史圖片選粹》，澳門：同善堂，2018年，頁107—108。

③ 〈同善堂義學校昨行畢業禮紀〉，《華僑報》（澳門），1938年1月17日。

④ 〈崇實學校體恤同善堂苦學生給予免費學額升學〉，《華僑報》（澳門），1948年2月15日。

⑤ 〈同善堂將贈種牛痘〉，《華僑報》（澳門），1940年1月24日。

⑥ 澳門檔案館藏，編號：MO/AH/EDU/FA/15/0001。

⑦ 〈同善堂鼓勵義學生，優異者獲贈難童餐〉，《大眾報》（澳門），1943年5月4日。

⑧ 〈同善堂值理常會紀〉，《華僑報》（澳門），1947年1月17日；〈各界繼續助同善堂〉，《華僑報》（澳門），1947年2月9日；〈黃豫樵熱心善舉〉，《華僑報》（澳門），1948年1月26日。

⑨ 〈同善堂值理推動善舉〉，《華僑報》（澳門），1948年2月15日；〈崇實學校體恤同善堂苦學生給予免費學額升學〉，《華僑報》（澳門），1948年2月15日。

⑩ 〈同善堂義學增設課室三間〉，《大眾報》（澳門），1948年7月2日；〈同善堂值理常會〉，《華僑報》（澳門），1948年8月1日。後座指的是林家圍四號樓下和六號樓上，見〈同善堂值理常會〉，《華僑報》（澳門），1948年3月18日。

⑪ 〈同善堂招收免費學生〉（廣告），《大眾報》（澳門），1948年9月20日。

⑫ 〈聖誕帶來幸福！輔助貧童會撥款分惠貧苦學生〉，《華僑報》（澳門），1946年12月24日；〈聖誕節同善堂值理膠鞋贈學生〉，《華僑報》（澳門），1947年12月23日；〈聖誕節慈善機關濟貧〉，《華僑報》（澳門），1948年12月21日。

⑬ 〈同善堂義校增五六年級〉，《華僑報》（澳門），1951年7月11日；〈鍾子光捐助同善堂辦學葡幣二千元〉，《華僑報》（澳門），1951年7月21日。

得林家一圍（教師里）七號和九號屋後，曾公開表示該兩址將用作擴充義校，廣收失學兒童。<sup>①</sup>1952年春，莫培樾任義學校長，小五和小六兩級亦先後於1951年的9月和1952年的9月增設。<sup>②</sup>由於增設高小，1951年7月增聘鄭志傑為小五級教員。<sup>③</sup>1952年春，何佳邦任教導主任，鄭志傑任輔導主任，並繼續聘用其餘五位教員。<sup>④</sup>1951年9月，校長黃仲良向教育督導處呈報1950年度下學期的資料，當時學校只設初小；男教員5名，女教員3名；男生225名，女生119名。1952年4月校長莫培樾呈報1951/52年度下學期的資料，學校設初小和高小；男教員5名（何桂邦、鄭志傑、鍾榮階、梁寶璿和廖芳），女教員2名（鍾兆貞和湯慧文）；男生225名，女生100名；其中高小男生只39名，女生14名，因其時尚未有小六級。至於課程方面，初小設有國語、國文、尺牘、常識和算術等五科，高小不設常識，但增加歷史、地理、自然和英語，共八科。<sup>⑤</sup>梁寶璿（璇）於1953年7月離職，改聘胡詠雯任教席，又鍾兆貞於1960年身故後，教席由區舜肅接替，<sup>⑥</sup>1958年再增聘盧超，而同善堂小學的教員數目截至1965年7月一直維持在8名，<sup>⑦</sup>1966年7月增至10名，<sup>⑧</sup>但到1969年底已是19名。<sup>⑨</sup>

順筆一提，同善堂從1944年春開始便獲政府資助為學童提供葡文課程，教員或由政府介紹或任命。政府對於課程也有一定的管理，如1944年7月份的考試便是由當時的民政廳長親自到場監考，當時義學的葡文教員為陳毅生。<sup>⑩</sup>查澳葡政府最遲於1924年便撥出專款資助華童學習葡語，對成績優異的華籍學生和葡文教員均定有獎勵的措

① 〈同善堂投得兩戶，將擴充平民義校〉，《華僑報》（澳門），1950年8月18日。

② 〈同善堂義學增設六年級〉，《華僑報》（澳門），1952年8月21日。

③ 〈同善堂增辦高小義學校〉，《華僑報》（澳門），1951年7月19日。

④ 〈同善堂義學刷新〉，《華僑報》（澳門），1952年1月25日。

⑤ 澳門檔案館藏，編號：MO/AH/EDU/CP/08/0019。從該校1952年度至1956年度的成績表所見，初小尚有美、勞、音、體等科目，見陳志峰編：《雙源惠澤，香遠益清——澳門教育史料展圖集》，澳門：澳門中華教育會，2010年，頁128。

⑥ 〈同善堂值理會決定下期義校教員照聘〉，《華僑報》（澳門），1953年7月26日；〈同善堂值理會議推出下屆新值理〉，《華僑報》（澳門），1961年1月12日。

⑦ 關於同善堂小學1960年代的8名教員，《同善堂中學校友會銀禧紀念特刊》（2014年）剛好有一篇1958/59年度小學第七屆畢業校友的回憶文章，見該書頁101—105。

⑧ 〈同善堂常會議決教員醫生約滿〉，《華僑報》（澳門），1965年7月14日；〈同善堂值理，前常務會議〉，《華僑報》（澳門），1966年7月15日。當時或有兼課教員，該堂呈報教育處的資料顯示1962/63年和1963/64年均見2名輔助教員，見澳門檔案館藏，編號：MO/AH/EDU/FA/15/0017、MO/AH/EDU/FA/15/0018。

⑨ 澳門檔案館藏，編號：MO/AH/EDU/FA/15/0031。

⑩ 〈學校消息〉，《華僑報》（澳門），1944年7月1日；〈教育消息〉，《華僑報》（澳門），1947年10月4日。根據1944年8月公佈的考試成績，當時獲津貼教授葡文的學校有望德（71名）、粵華（74名）、吳靈芝（21名）、兩芬（30名）、同善堂（36名）、崇實（33名）、花地瑪（40名）和夜校（13名），合共318名學生。澳門檔案館藏，編號：MO/AH/EDU/JIECM/03/0002。

施。<sup>①</sup>1954年7月，更有接受資助的九所澳門學校舉行葡文會考（表2）。<sup>②</sup>

1960年以後的情況有待整理。至於葡文課的具體授課情況如何暫不詳，如若參照另一所接受津貼的公教學校的情況，也許就是每天下午有兩小時的葡文課。<sup>③</sup>

表2 同善堂義學從政府所得推廣葡文教學津貼

年份										
津貼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600	300	600 (55 人)	600 (55 人)	900	1,200	1,200		
年份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津貼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900	900	9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華僑報》的報導，並與《澳門憲報》/《澳門政府公報》上刊登的參校，為省篇幅，不另作注。另可參考鄭振偉：《1940年代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頁160—163。

#### 四、1949至1970年的發展

同善堂義學於1948年8月獲准立案，<sup>④</sup>但因立案須符合一些原則，故值理會曾議決義學改名為“同善堂小學校”。<sup>⑤</sup>除了辦理日校外，同善堂此時亦開始籌設夜校。1949年1月，副主席葉子如提議開設夜校，由於鍾子光早已同意贊助，免費夜校迅即於1949年的正月上旬招生，正月二十一日（2月18日）便即啟課，名額200人，<sup>⑥</sup>初小四個年級剛好是每級50人。至於教員方面，則由日校教員兼任，鍾榮階和何桂邦兩人月薪30元，其餘五位教員月薪20元。<sup>⑦</sup>1952年秋，日校續聘教員一律按月加薪10元，以資鼓勵。<sup>⑧</sup>此外，同善堂或曾於1951年秋舉辦夜間識字班，對象是失學青年，

① “Proposta No. 35”（〈關於特給華人所設之公教學校補助費〉），*BOGPM*, 1924-No. 25, 21 Jun 1924, p. 473。第35號提案於當年7月1日給予公教學校年度補助費1,296士姑度，讓該校聘請葡語教員，其中規定每月上課學童人數不得少於25名，否則終止補助。“Proposta No. 34”（〈關於政府自辦及補助各校之華籍學生〉），*BOGPM*, 1926-No. 50, 11 Dec 1926, p. 876; “Diplomas Legislativos Provinciais No. 26”（〈飭設立獎額十名以鼓勵中國學生〉），*BOGPM*, 1927-No. 22, 28 May 1927, p. 415。第34號提案討論鼓勵在政府或政府補助學校學習葡文的華籍學生，擇優給獎；第26號立法證書設立10個獎額獎勵各小學校葡文讀寫程度優異的華籍畢業生，又連續三年有最多華籍學生獲獎的三名教員將獲頒發榮譽證書，另每年有最多學生獲獎的教師可獲獎勵100元。

② 〈葡文會考莫德炎冠軍〉，《華僑報》（澳門），1954年7月20日。參加會考的包括同善堂、孔教、聖若瑟、吳靈芝、粵華、慈幼、公教、氹仔聖善和路環方濟覺等校。

③ 〈公教學校增設葡文專修班〉，《華僑報》（澳門），1942年3月15日。

④ 聖若瑟附小、紀中附小、崇實附小和同善堂義學等四校於1948年8月同時獲准立案，見〈學校消息〉，《世界日報》（澳門），1948年8月17日。

⑤ 〈同善堂值理議決中元節辦超幽〉，《華僑報》（澳門），1948年8月10日。前引〈同善堂大事紀要〉記義學於1965年正式易名為同善堂小學，應有所據，但該校1952年度的成績表和1959年度的畢業證書等文獻已見用上“澳門同善堂小學”的名稱。此外，就報章斷續所見同善堂祀孔的祝聖儀式，於恭讀祝文後例有奏唱校歌，1959年及以前唱的是同善堂義學校歌，但1960年開始改唱同善堂小學校歌。

⑥ 〈同善堂嘉惠貧童〉，《市民日報》（澳門），1949年1月24日；〈同善堂互選〉，《華僑報》（澳門），1949年2月3日。

⑦ 〈同善堂夜學已定期開課〉，《大眾報》（澳門），1949年2月13日。

⑧ 〈同善堂以藥品贈氹仔難民營〉，《華僑報》（澳門），1952年7月28日。

課程以信札、珠算和筆算等為主。<sup>①</sup>1950—1954年正月值理會上報告前一年日夜男女義學人數，即1949—1953年各年度歲末的人數，湊巧同樣都是560名，也許這就是當時義學能夠容納的學生人數上限。<sup>②</sup>1953年12月，有一則新聞可以佐證日校學生人數為360名。<sup>③</sup>1959年7月值理會又決定擴充夜校名額，小一至小四年級各增收新生25名，<sup>④</sup>但1961年9月開學時的班額仍是每級50名，報導指夜校的教學側重商業常識，如二年級便有珠算，以便學生在商場謀生。<sup>⑤</sup>就該校夜班成績表所見，1961年度的科目有國語（分讀書、尺牘、作信和書法）、算術（分珠算和筆算）和常識三科，1962年度開始增加英語。<sup>⑥</sup>1967年增設預備初班，翌年再設高班；1968年夜校也增設高小班級，1970年7月夜班第一屆學生畢業（表3）。<sup>⑦</sup>

表3 1949—1970年同善堂義學／小學日夜校學生人數

年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人數	日	360	360	360	360	360	384	384	382	365	366	426*	不詳
	夜	200	200	200	200	200	/	/	/	/	/	/	不詳
年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人數	日	/		420	408	398*	284*	261	307	不詳	不詳	519	477
	夜	/					97*	64	103	不詳	不詳		

資料來源：數據來自《華僑報》所見同善堂每年正月值理會的報告，來自他處或有不一致的資料另加注。數據是每年歲末的人數，又部分是日夜校合計的人數。《同善堂一百周年特刊》（澳門：同善堂值理會，1992）第82頁所見的歷屆學生人數，日校的記錄始於1953年，夜校的記錄則始於1970年，故筆者不憚其煩於此表列相關數據。

\* 1959：1959/60年度學生共436名（男生252名，女生184名），教師8名（男5名，女3名）。澳門檔案館藏，檔號：MO/AH/EDU/FA/15/0006。

1963：1963年12月底學生人數為381名（男生218名，女生163名），檔號：MO/AH/EDU/FA/15/0017。

1964：1964年12月底學生人數為328名（男生190名，女生138名），檔號：MO/AH/EDU/FA/15/0018。

1969：1969年12月底學生小學人數為519名（男生317名，女生202名），預備班120名（男生68名，女生52名），檔號：MO/AH/EDU/FA/15/0031。

1970：1970年12月底學生小學人數為477名（男生311名，女生166名），預備班130名（男生71名，女生59名），檔號：MO/AH/EDU/FA/15/0027。

- ① 〈同善堂增設夜學識字班〉，《華僑報》（澳門），1951年7月29日。
- ② 〈同善堂值理互選〉，《華僑報》（澳門），1950年2月22日；〈一年之計在於春〉，《華僑報》（澳門），1951年2月11日；〈同善堂昨開值理會〉，《華僑報》（澳門），1952年2月1日；〈同善堂值理互選結果黃仲良仍任主席〉，《華僑報》（澳門），1953年2月19日；〈收入減少救濟支銷浩繁〉，《華僑報》（澳門），1954年2月8日。1960年的一則報導中就有同善堂小學每年收容日夜貧苦學童560名的說法，見〈李際唐遺訓捐款同善堂小學〉，《華僑報》（澳門），1960年11月16日。
- ③ 〈鞭爆聲聲街道暢旺，聖誕節市面熱鬧〉，《華僑報》（澳門），1953年12月25日。澳門救濟總會撥贈聖誕恩物款500元予同善堂義學，每人1.4元，共504元，不足數額由校方補足，人數剛好是360名。
- ④ 〈同善堂小學夜校添招新生〉，《華僑報》（澳門），1959年7月28日。
- ⑤ 〈同善堂招夜班生，九一考試〉，《華僑報》（澳門），1961年8月26日；〈同善堂夜校招生，今起報名〉，《華僑報》（澳門），1962年8月27日。
- ⑥ 陳志峰編：《雙源惠澤，香遠益清——澳門教育史料展圖集》，澳門：澳門中華教育會，2010年，頁129。
- ⑦ 〈同善堂學校結業，廿八日考入學試〉，《華僑報》（澳門），1970年7月18日。

同善堂從 1925 年開始每年獲政府資助 500 元（西紙），<sup>①</sup>1939 年又得到“慈善救濟委員會”按月資助 166.66 元（西紙），<sup>②</sup>1947 年被納入“公共救濟總會”轄下。<sup>③</sup>由於是接受補助的機構，平政院（現稱“行政法院”）於 1935 年 8 月公佈規定，同善堂須於每年 9 月 30 日前呈報預算冊，<sup>④</sup>而《澳門憲報》或《澳門政府公報》所見核准的同善堂預算冊始於 1937 年。1937 — 1970 年預算冊中的部分數據現整理如下（表 4）：

表 4 1937 — 1970 年同善堂預算冊的總預算和義學預算

年度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總預算	25,283	24,670	25,960	25,400	28,900	28,800	34,888.72	34,680
義學預算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年度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總預算	34,403	38,983	35,479.73	35,926.67	39,762.46	41,353.23	45,358.37	46,165.72
義學預算	2,500	2,500	2,500	3,000	6,000	6,000	6,000	6,500
年度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總預算	46,196.87	45,993.69	45,696.87	45,419.67	49,321.89	56,091.29	71,578.34	71,091.73
義學預算	6,500	6,500	6,500	6,500	6,500	7,200	9,000	9,000
年度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總預算	71,022.6	不詳	82,167.08	82,206.7	83,075.55	83,134.01	84,461.46	84,955.11
義學預算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500	9,500	11,000
年度	1969	1970	/					
總預算	252,887.75	283,298.25						
義學預算	50,000	50,000						

資料來源：數據整理自 1936 年 12 月至 1969 年 12 月《澳門憲報》/《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的資料，1944 年及以前預算的幣值為毫銀，1945 年及以後的為西洋紙（大西洋銀行發行的紙幣），1956 年及以後的不再標明。

上述的預算大致能反映同善堂義學發展的一些蹤迹。1947 年以前大致穩定，1949 年的預算從前一年的 3,000 元倍增至 6,000 元，其時正是同善堂義學成立校董會並向僑委會註冊，之後便是加設高小和開設夜校。1959 年的預算增至 9,000 元，增幅也是明顯的，其時有報導指同善堂積極策進校務，文娛方面尤多建樹，包括聘用體育老師，開設乒乓球室和增設圖書館，時維 1960 年 4 月該校舉行春季旅行；又有指學校當局銳意刷新，

① “Diplomas Legislativos, No. 3”（〈准每年撥給同善堂補助費〉），*BOGPM*, 1925-No. 10, 7 Mar 1925, p. 136. 見於民政廳的相關資料，可參考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頁 201 — 204。

② 〈澳門政府捐助慈善費〉，《華僑報》（澳門），1939 年 2 月 15 日。

③ 〈公共救濟事業革新章程〉中譯本見 *BOCM*（《澳門政府公報》），1947-No. 14, 5 Apr 1947, pp. 325-328.

④ 澳門平政院會計科 1935 年 8 月通知各機關的佈告，其中同善堂屬行政團體，須依〈屬地改善條例〉第 725 款各項規定向平政院呈核賬目，限期是每年 9 月 30 日以前。見〈澳門平政院會計科佈告〉，《澳門憲報》，1935 年第 32 號，1935 年 8 月 10 日，頁 1067。又 1947 年〈公共救濟事業革新章程〉第 13 款規定接受補助之慈善機構須於每年 11 月 30 日前將下年度預算冊經傳教會會長轉送公共救濟總會審核，而值理會的記錄亦見依照總會要求送交收支預算數目，見〈同善堂值理常會〉，《華僑報》（澳門），1948 年 10 月 8 日。

特別是體育的發展迅速，乒乓一項極有好評。<sup>①</sup> 體育老師指的是 1958 年初受聘的盧超，他是籃球宿將，綽號“生張飛”。<sup>②</sup> 盧超和張劍秋也擅長乒乓球，二人曾以同善堂隊的名義角逐乒乓總會第十四屆理監事之職。<sup>③</sup> 至於圖書室則是於己亥年（1959）春祭那天正式開幕的，報載圖書室“縱橫達三丈，四面皆窗，中置長檯及木椅，已藏有圖書三千本”。<sup>④</sup> 又往後數年也見學校旅行和學生運動比賽的報導。<sup>⑤</sup> 此外，同善堂或於 1960 年便已有意建設小學校舍，報導見李際唐於 1960 年 10 月逝世後，他的後人按其遺願捐贈 5,000 元作為同善堂小學的建設經費，又值理胡俸枝於 1961 年 8 月亦曾致函向同善堂認捐建校經費 5,000 元，<sup>⑥</sup> 只是建校所費不菲，才遲至 1966 年由新馬劇團義演籌款玉成其事。<sup>⑦</sup> 1969 年同善堂小學的預算激增至 50,000 元，這與 1968 年小學校舍的落成以及學生和教師人數在 20 世紀 60 年代末持續增長不無關係。《華僑報》在報導同善堂值理會的會務時似乎總是把校務併入施濟部的報告，這或是出於篇幅的考慮，但由於施濟的報告在先，結果是校務總是列於贈醫、施藥、施棺、施粥、施寒衣、施薑醋柴米、施種洋痘等善舉之後，筆者將《一九六七年度第七十六屆議案簿》2 月 13 日的會議記錄與 2 月 14 日的報導對比後才發現其中端倪。<sup>⑧</sup> 《華僑報》大約是 1963 年初才間歇出現“校務部報告”獨立於“施濟部報告”的報導，也許是校務報告內容增加，已不宜合併，而暫時看到最早標示為校務報告的是 1963 年正月開學和日夜校學生註冊人數事宜。<sup>⑨</sup> “施濟部”從 1968 年開始改名為“福利部”，而這時候的教育和福利才成為兩個被分別報導的項目。

預算並不等於同善堂的實際進支，值理會每年正月的年度報告所列的支出總是遠超預算，救濟所需總是難以預料的。當然，義學的支出是相對穩定的。又即使在報上所見的預算經費，與《澳門政府公報》上的其實也有出入，如 1942 年 3 月的報導，大

- ① 〈春日好郊遊同善堂校旅行〉，《華僑報》（澳門），1960 年 4 月 14 日；〈學校消息〉，《華僑報》（澳門），1961 年 7 月 18 日。
- ② 〈體壇蟹眼浮香〉，《華僑報》（澳門），1958 年 5 月 20 日。
- ③ 〈乒乓總會定期改選〉，《華僑報》（澳門），1962 年 3 月 23 日。澳門乒乓總會於 1951 年成立後的辦事處其實就設在同善堂。
- ④ 〈同善堂昨春祭〉，《華僑報》（澳門），1959 年 3 月 18 日。
- ⑤ 〈兩間小學發生打鬥，同善堂打勝，踢小球公進負二比零〉，《華僑報》（澳門），1960 年 4 月 25 日；〈同善堂義學秋季旅行叻仔〉，《華僑報》（澳門），1963 年 10 月 30 日；〈同善堂舉辦班際小球比賽〉，《華僑報》（澳門），1963 年 11 月 25 日。同善堂小學的教員鍾榮階約在 1947 已是公進義學的校長。
- ⑥ 〈李際唐遺訓捐款同善堂小學五千元為建設經費〉，《華僑報》（澳門），1960 年 11 月 16 日；〈同善堂籌建校舍胡俸枝捐五千元〉，《華僑報》（澳門），1961 年 8 月 7 日。
- ⑦ 〈為同善堂義學籌擴建經費〉，《華僑報》（澳門），1966 年 9 月 16 日。從 1965 年 7 月至 1966 年間 9 月期間的報導所見，同善堂收到社會各界捐款約為 133,400 元，大宗捐款包括高德成堂和救濟總會各五萬元，區子燕和李世明各一萬元，另新馬劇團義演籌得 155,000 元。又庇山耶街改建為校址的地段只有部分為同善堂產業，其後由黃慧珍女士捐贈 64 號和 64 號 A 的五成業權，見〈擴展免費教育同善堂擴建校舍〉，《華僑報》（澳門），1965 年 6 月 26 日。捐贈者與何賢的妻子姓名相同。
- ⑧ 〈同善堂值理互選，崔德祺輝聯主席〉，《華僑報》（澳門），1967 年 2 月 14 日。編輯將“(乙)校務部報告”標題刪去，將該項的一則報告列作“施濟部報告”的第十項。1967 年度的議案簿是同善堂現存最早的議案簿，該頁面見《同善堂歷史檔案文物選錄》，澳門：同善堂，2020 年，頁 31。
- ⑨ 〈同善堂值理就職後，澳督首長致函道賀〉，《華僑報》（澳門），1963 年 2 月 20 日。

意是依照上年度的支出來估算，壬午年（1942）的預計收入為雙毫 13,168.5 元、港紙 16,748.5 元，而預計支出為雙毫 45,770 元、港紙 4,250 元，但所見各項支出就只義學一項雙毫 2,500 元，與《澳門政府公報》上的相同（表 5）。<sup>①</sup>

表 5 1945 — 1956 年同善堂進支數及義學項目支出

年度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收入	172,559	58,588.8	42,100	48,890	60,884	86,313
支出	163,333	62,687	32,200	42,119	58,403	93,337
義學項	2,680	2,925	4,830	13,270	12,160	10,775
年度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收入	126,998	222,556.5	133,284	136,462	120,475.61	100,552
支出	139,084.6	233,452.5	165,460	115,806	130,314.1	126,835
義學項	15,047	12,464.9	13,380	不詳	14,327.65	14,386

資料來源：數據整理自《華僑報》所見同善堂每年正月值理會的報告。又《澳門同善堂徵信錄（戊戌年）》（1958 年）所錄各年的進支與報章所見數據不同，原因待考。

## 五、總結

澳門的華人教育一直沿襲中國傳統的教育模式，設立義學教導族黨鄉閭子弟是固有的傳統，清代康熙五十二年（1713）曾“令各省府州縣多立義學，聚集孤寒，延師教讀”，<sup>②</sup> 晚清時期有識之士深諳讀書明理關乎風俗人心，也認為中下家庭子弟的養和教，官府責無旁貸，<sup>③</sup> 又陳子褒更把義學視之為“救國之命脈”。<sup>④</sup> 在 20 世紀前期，澳門華人社群的教育主要由華人自理和教會辦理，當時的義學有鏡湖義學、平民義學、公教義學、孔教義學和同善堂義學等，而筆者發現這些義學的執事者或有重疊。回顧同善堂的歷史，救濟失學並不是創辦時的業務，所以譚鍾麟在同善堂的碑序中才寄望能次第舉行養老和義學等義舉。近現代華人社會自發籌設義學供貧困家庭兒童求學是一種常見的救濟模式，同善堂於其後的發展並無例外。也許是基於民胞民與的精神，同善堂的前賢就是這樣建立了一所由華人慈善團體辦理的義學。1933 年澳門有 98 所私立華人學校，當中便有 14 所男義學和兩所女義學，到 1940 年代更因難民的湧入而出現不少難童義學，<sup>⑤</sup>

<sup>①</sup> 〈同堂善經費不敷〉，《華僑報》（澳門），1942 年 3 月 22 日。

<sup>②</sup> 《皇朝文獻通考》，參見《四庫全書》第 69 卷，葉 42 下。

<sup>③</sup> 〈推廣義塾說〉一文提出地方有育嬰堂、養老院、清節堂、義倉、義塾等五種善舉，當中以義塾為大，中下人家子弟能稍讀數年書，可以粗知大義而不至性情氣質盡喪，及長能成為善良之民，而養正在於童蒙。見《申報》（上海），光緒八年二月初七日（1882 年 3 月 25 日），版 1。

<sup>④</sup> 陳子褒：〈為留港中國學生設立策群義學代勸各界捐助小啟三〉，《策群雜誌》（香港），第 1 期，1922 年 1 月，頁 79。此文於陳子褒《教育遺議》（台北：文學出版社，1973 年）中題作〈聖士提反義學勸捐啟〉，見該書第 165 — 166 頁。

<sup>⑤</sup> 1950 年以前澳門義學的一些發展情況可參考鄭振偉《1940 年代的澳門教育》的第三章。

而隨着澳門社會環境的變化，1950年代以後有更多公會和行業名義的義學。同善堂義學不是澳門最早的義學，跟其他義學也有不同的發展軌迹，它經過書塾至小學的轉變，但卻不是那種設於宗祠或廟宇的義學，也不像宗族、公會又或行業類型的義學那般規定入學的對象。1920年代的平民義學有明確的目標，所以通過各種籌款和募捐的方式盡力開設分校至七所之多，儘量救濟失學的貧困兒童，並籌建校舍而不只是寄身於民房或廟宇。鏡湖義學源於1892年的義塾，歷史悠久，較早開始各方面的變革，於1928年便已有獨立的校舍而不是散落在醫院各處的課室。<sup>①</sup>而這兩所學校其後更在何賢的推動下合併並不斷改進。<sup>②</sup>

同善堂的紳商以施濟為心，在華人社群中以身作則，從事各種救濟和慈善活動，不但凝聚出各界同心向善的力量，且隨着其善譽日隆，澳葡政府亦不得不予以重視、認可甚至是籠絡，但即便如此，從政府所得資助仍是有限的。辦理義學的初衷原是救濟失學，但同善堂並沒有開設分校，只是以有限的資源不斷增加課室和學額，開設夜校擴大收生的對象，最後是籌建獨立的校舍改善教學環境和設備，為學生提供更好的免費教育。某些取名義學的學校或只是免收學費，仍酌量收取雜費，但同善堂堅持的是完全免費，並且提供書籍和文具，又由於出外活動時須顧及觀瞻，同善堂早期亦曾為學生訂製校服，又或給學生購置鞋履或衣帽之類的用品。<sup>③</sup>由於資料有限，本文未能對同善堂義學的課程和教學有具體的論述，但報導所見義學十分關注學生的品行，期望他們在社會上循規蹈矩，毋負善長的期望，而1944年更有一則報導學校增教“道理書”一科。<sup>④</sup>1945年3月澳門華視學會曾有學校調查，其中一項是關於學校的課程、設備、衛生和管理等，同善堂義學位列十所辦理得最好的小學中（令人詫異的是十所有四所均為義學）。<sup>⑤</sup>在學校的活動方面，早期義學學生多是參與孔誕和全澳的一些巡行或慶祝活動，20世紀50年代末才有康體文娛類的活動。在獎勵學習方面，主要是學期末品學兼優的學生能獲得禮物或獎金，更曾有以金牌作為獎品，豐富程度堪稱冠絕澳門。過去的義學主要是為貧困家庭的兒童而設，師資和課程的規範也許不如某些私立學校，學生或許有一定的流動性，也不是所有入學的都能夠完成初小或完整的小學階段的學習，但前賢所設義學對

<sup>①</sup> 據梁彥明所述，鏡湖值理會籌設義學校舍的建議實來自崔諾枝，用抽彩法募款萬餘元，新校落成，名額從每年三百擴充至五百，其後又在下環大街設分校，以便幼童和漁民子弟上學。見梁彥明：〈鏡湖醫院的善績〉，《崔諾枝先生善績紀略》，澳門：澳門中華印務公司，1938年，頁11。

<sup>②</sup> 鏡湖和平民兩校合併初期，鏡湖慈善會的會議上曾討論過一項題為“平民學校應予改善”的議案，直指鏡湖平民聯合小學收容學童未符救濟失學原則，大意是收生只以考試成績為標準，出現有能力交學費者被取錄，無能力交學費者則落第失學的情況，有失慈善會救濟文盲和收容失學的宗旨，應予以改善。該議案經議決後原則上通過，並交由下屆董事會辦理。見〈鏡湖慈善會昨代表大會〉，《華僑報》（澳門），1950年2月16日。

<sup>③</sup> 〈同善堂義學校購帽贈予學生〉，《市民日報》（澳門），1945年1月11日；〈有姓名助三千元賞同善堂義學生鞋〉，《大眾報》（澳門），1945年5月11日。

<sup>④</sup> 〈同善堂義學校昨行畢業禮紀〉，《華僑報》（澳門），1938年1月17日；〈教育消息〉，《華僑報》（澳門），1944年7月5日。

<sup>⑤</sup> 鄭振偉：《1940年代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頁81。

於推動澳門普及教育的作用毋庸置疑。

（鳴謝：本文引用之《澳門同善堂徵信錄（甲戌年）》和《澳門同善堂徵信錄（庚辰年）》皆為羅景新先生藏品，又承同善堂歷史檔案陳列館借用藏品，周嘉豪先生居中協助，另林顯富校長惠教前賢往事，謹在此一併致謝意。）

[ 責任編輯 陳超敏 ]

[ 校對 陳嘉欣 黃耀岷 ]